

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成果
ZHEJIANGSHENG MAKESI ZHUYI LILUN YANJIU GONGCHENG CHENGGUO

光荣与梦想

斯大林体制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抉择

GUANGRONG YU MENGXIANG

SIDALIN TIZHI HE MINZU GUOJIA DE XIANDAI JUEZE

沈国权 林小芳◎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光荣与梦想

斯大林体制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抉择

GUANGRONG YU MENGXIANG

SIDALIN TIZHI HE MINZU GUOJIA DE XIANDAI JUEZE

沈国权 林小芳◎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荣与梦想：斯大林体制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抉择/沈国

权，林小芳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4

ISBN 978 - 7 - 5136 - 0610 - 3

I. ①光… II. ①沈…②林… III. ①斯大林，J. V.

(1879 - 1953) —人物研究②苏联—历史—研究

IV. ①A745②K51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587 号

责任编辑 乔卫兵 于 宇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610 - 3/F · 8776

定 价 39.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 - 68344225 88386794

前言

斯大林及其体制之厄

过去比未来拥有更多的未来。

—— 德勒兹

轻轻的
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1917年11月7日，停泊在波罗的海的“阿芙罗尔”号巡洋舰象征性的几声炮响，敲碎了俄罗斯帝国老迈的步伐，奏响了世界历史的新乐章。谁曾想到，冬夜寒风中几乎不放一枪的政权更替，竟然拉开了一场持续深远的社会变革。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面对“全球观众”象征性的告别演说，正式向世界宣告一个世纪大国的解体。谁曾想到，同样冬夜寒风中没有流血的政权交接，终止了一场持续百年有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专制恐怖”和“冷战霸权”等的争论。

弹指七十四年，苏联这个名动一时的社会主义大国，就这样在“战争与革命”的岁月里轻轻地来，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悄无声息地离去，好像突然闯入20世纪的一位过客，来去匆匆，挥手之间，没有带走人



间的一片云彩。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这是一个影响了人类历史、影响了社会发展、也影响了世界进程的过客，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很长时期内，它是世界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是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争霸冷战的旗手。它兴衰成败的每一步不仅紧紧牵动着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且深深影响着世界力量、秩序与思想变动的神经。

这也是一个无法让时间忘却的过客，在它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全球性的国家间战争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与科技文化的深刻转变。霍布斯鲍姆指出：“1914 - 1991 年，虽然有人否定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却毫不怀疑它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七十多年间，国际政治完全着眼于两股势力之间的长期对抗，也就是旧秩序对社会革命之争。而社会革命的体现，则落实在苏联与共产国际身上，彼此兴荣，息息相关。”^① 来去匆匆，苏联还是为世界带来了惊喜、感动和永恒，留给后人惆怅的回忆和述说不尽的故事。

1500 年以来，继工业革命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社会革命确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启蒙运动奠定现代文化精神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领域中所向披靡，构筑起一个以西方（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资本主义成为普世的价值观，成为与传统对立的“现代”代名词，成为引导人类迈向繁荣进步的领航者。然而，不乏血腥、暴力、征服和剥削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带给人类共同繁荣的福音，高歌凯进的经济文化孕育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现代性阵痛和危机，引起欧美乃至世界各阶层、各领域有识之士的质疑、批判和思索。他们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如卢梭指出“把土地用栅栏围起来，宣布‘这是属于我的东西’，并设法使别人予以承认，这就是私有制社会的创始者。但是如果当时有人愤怒地站出来，拔掉栅栏并向大家宣布‘不要相信他骗人的鬼话。土地是自然赋予我们大家的赠品，而不是

① [英]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79。

某个人可以占为私有的私物。’的话，人类也许就不会遭遇到犯罪、战争、屠杀、恐怖等灾难”。布鲁顿在《什么是私有财产》一书中指出“私有财产就是掠夺而来的东西”。财产私有制成为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战争、屠杀、种族歧视和各种犯罪的最终根源，为了建立一个人们不仅在社会身份上完全平等，而且在物质财富占有上也完全平等的、真正公平的理想社会，西方学者展开了一场“为人类寻找一种公平、完美、道德的理想社会体制”的大讨论，纷纷设计和提出种种超越资本主义弊病的救世良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点燃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从理论上描绘了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唤起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与追求。

19世纪中叶，德国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详细剖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换句话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狭隘生产关系日益容纳不下也支配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法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结果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是资本家，另一方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①，即社会日益分裂成无产者和资产者两极，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商品大量积压、物价飞涨、企业倒闭、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失业……最后形成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即经济危机，进而引起普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阻碍了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时，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生产资料的占有适应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其中“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

^①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3-674。



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①。这个线索就是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作为统一的经济主体占有和支配全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管理和分配。这个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这种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孕育并成熟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被马克思命名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全人类完全平等的理想社会。简言之，共产主义社会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和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③。因此，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演变和爆发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获得高度发展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了，于是，怀揣共产主义希望的工人在发达的英、法、德等国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革命努力。

然而，“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共产主义社会应该首先走进西欧、北美这间“发达国家的屋子”，可是，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努力，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一道缺口，使社会主义这位不速之客走进了俄国这间“不发达国家的屋子”。30年后，俄国点燃的这把社会主义圣火又在同样落后的东欧、东亚、南美等地星火燎原，最终汇聚成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两极对峙的格局。在这一对峙主线的引导下，全球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资本主义制度更多地关心“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同时，还存在着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义力图吞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想战胜资本主义的对立，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前进步伐。

革命把俄国人民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苏联在“先天不足”的社会、历史和国际环境下，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自觉运动，进行了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社会形态的伟大尝试。苏联的崛起使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与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的社会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各项原则有了一个可供对照和验证的样板，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观念、制度、价值与结构的变动；直接或间接地构建了后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使社会主义的影响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地带。苏联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主导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与永恒，理想、信念、力量、激情、感动、悲伤、成功、自信……串联起一幅幅场面宏阔的画卷，伴随前行的是世界各国政界、知识界和社会民众无穷无尽的思考、争论与批判，包括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还是一场革命，如何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有哪些经验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以及俄国（苏联）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型、国际格局的长期变动等一系列问题。

其中，影响最广泛、争论最激烈、评价最困难的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以高度集中、高速增长和全面控制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即斯大林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建立最早、形态最完备、推行范围最广的社会主义体制，一度成为世界各社会主义政府普遍接受的“模式”，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与研究的焦点，尽管有关斯大林体制的各种论著汗牛充栋，正正反反、褒褒贬贬的评价却众说纷纭，褒之者把他推举为俄国历史上唯一能够跟彼得大帝齐名的伟人；贬之者则视他为人类历史上极权恐怖统治下的杀人魔王，至今难以盖棺定论。从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体制的重重面纱开始，历经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敲击，步履蹒跚的斯大林体制日益松动。1989-1991年，肇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两德统一的苏东剧变成为压跨斯大林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斯大林体制并没有随着苏联这座大厦的轰然倒地而彻底远离世间，它的光环、身影、创痛与烙印还隐隐约约潜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观念中，激励、阻碍或影响着原苏东地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的前进方向。为此，客观公正地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不仅对于人们了解苏联现代历史、评



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颇有意义，而且对于人们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裨益良多。

第一，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认识斯大林模式。

众所周知，历史是一种先后相继、前因后果的普遍联系。因此，人们在观察历史事件、分析历史问题时，既要注重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基本因素，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勾勒出社会横断面的整体面貌，把宏观到微观的现象还原统一到广泛的历史空间里；还要从长期社会变动中纵深把握历史本身的脉络与身临其境者的具体思想和行为，避免拘泥于一人一事的短期成败贤愚，保证历史叙述与研究的完整性。例如，美国独立战争做为单一历史事件，仅仅是一次美国殖民地人民摆脱英国直接控制的政治诉求，就像历史上其他争取独立的革命或战争一样，其影响只是局限在世界体系边缘的短期事件，并没有对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造成直接的损害或影响。如果将美国独立与世界历史的长期变动联系在一起，美国的建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丰富内涵，它既是人类社会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确立了足以成为随后几个世纪各国人民效仿的典型样板，也是国际关系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标志着美洲逐渐从默默无闻的附属地位走向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央，在随后世界力量消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同期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探险航行，就当时的直接目的和影响而言，无非是欧洲君主到东方寻找黄金的私利行为，但是，探险开辟的新航路无意中启动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大门，引起了现代社会的长期转型和世界格局的转变等等。因此，当我们从较长的周期来审视历史时，就会如布罗代尔分析“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样，重新认识人类已有的经验、结论和观念。

因此，纯粹从政治上来谈论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危险的，这不仅容易被意识形态的迷雾所遮蔽，从而束缚于细小的事件或个别问题的是非，甚至还有琐碎的感情干扰，一叶障目。本书的第一个出发点是，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研究苏联 74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把它“放在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与实际发展的坐标上，来进行一番分析

和研究，也许可以把某些主要问题看得更加清楚”^①。即使从1989年苏东剧变算起，历史已经远离我们20年的距离，这为我们今天的再次回顾创造了长期观察的条件。无论是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还是用长周期的理论分析，认识和分析斯大林模式决不能将它仅仅局限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30年，必须从俄国社会的前后差异或联系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过去和未来的本质，才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晰、更容易地理解和评价斯大林所确立的这个体系。

一是跳出苏联单个国家的范围，把斯大林模式摆到整个现代世界的地图里。20世纪初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版图，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端和较量正在酝酿，战争阴云笼罩着整个世界，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遍酝酿着起义、革命与战争的气氛，如福柯所说的在“和平的瞬间——仅仅只是瞬间——也汹涌着战争的潜流”。相比之下，苏联是地球的一个孤岛，广袤的疆域内外，充斥着各种扼制、颠覆、绞杀的“四面楚歌”，可以说，地理范围内的苏联呈现出典型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处境，这构成了斯大林体制生成的外部环境；二是跳出时间的约束，绝对不能把斯大林体制简单地认同为斯大林个人的产物，也不能将他仅仅停留在斯大林个人的生命周期里。必须把斯大林体制放到俄国的历史、苏联的生命周期中，既要向前追溯到十月革命甚至更早的时期，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寻找斯大林模式产生的背景和根源；同时也要往后延伸到“苏东剧变”之后，从斯大林逝世直到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去定位这种体制的性质和地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轨迹中去认识斯大林及其创立的社会主义体制。

19-20世纪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全面繁荣的两个世纪，经济上表现为科技革新带动的生产力飞速发展，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主政治的确立，社会上表现为传统文明向现代世界的转型，文化上表现为世俗化、大众化和多元化的价值发展。以此衡量，资本主义迟到者的俄国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正式解决这三个问题，列宁、斯大林等人在政治革命创造

^① 徐葵：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



的条件下走出这条跨越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完成了其他许多国家与民族费时长久都没有完成的艰巨任务，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评价：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国。显然，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苏联民族国家的现代抉择，它包含了从工业化、现代化到发展转型理论的方方面面，如合理化的工业生产、官僚化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活动、越来越小的农业部门、城市化的环境、广泛的受教育机会、实行技术培训、社会计划化、发展科学、传媒产品在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等。

因此，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并非其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权力斗争中取胜的结果，明显地存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历史的伟大实践。可以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且产生了英雄的时代。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扩张与殖民掠夺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对立，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受压迫、剥削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后者如何获得民族独立，争取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必须克服的历史与现实课题，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在这些国家都不具备，资本主义道路本身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与批判，因此，落后国家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后，选择社会主义成为他们迅速完成工业化、迈向现代文明的一种希望，对此，斯大林模式显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苏联实践的成功与失误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丰富而有效的路标。

第二，还原历史、具体而微。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是，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创造历史。因此，马克思认为，历史分析法是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的基本方法，对于任何人物或事件的评论必须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准确把握事物或现象的本质，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抽象地谈论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等概念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容易走入歧途。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段尘封的往事，重新分析和评价苏联革命、社会主义体制和斯大林执政期间各种措施的是非得失时，决不能犯脱离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错误，我们要设身处地地进入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感受、思考、衡量与评价，避免以现在的、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去衡量过去的历史事件，譬如苏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粗放型、资源浪费、低效率和效益、重增长而轻发展

等，这些既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病症，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错误，这是人类现代社会兴起以来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无论是先于苏联实现现代化的英、美、法等国，还是后于苏联走向现代道路的国家，普遍经历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事实上，发展的概念、现代化的思想、集约型的理论等都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才逐渐被学术界提出并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如果要以这些后人的标准去衡量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战略、手段或体制，无异于以自由民主去约束秦始皇和恺撒，形而上学并且不切实际。此外，一定的历史阶段有这个时代的条件、环境与任务，决不能以后来的历史结果作为判断当时体制是非对错的标准，作为检讨先前原因是否合理的标准，否则就只能在历史因果循环的迷宫中四处乱窜，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与出口，也就无法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历史。

具体而言，斯大林时期苏联面临着三重压力：理论与实践的压力、战争的压力和时间的压力。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压力。社会主义理论起源并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却出现在东方相对落后的准资本主义国家，时空错位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差相当明显。可以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理论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供参考，实践中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条件。十月革命胜利之际，列宁就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①这个经验就是列宁、斯大林亲手开创的实践经验，这个实践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协调、弥合或处理好跟理论的差距与矛盾，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发展动力和追求目标等。其次是战争的压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在这个战争与革命此起彼伏的年代，不仅资本主义世界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数不清的压力和困境。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亡“苏”之心不死的欧美各国，针对苏联的围剿、颠覆、进攻和战争一直如影随形地存在，最终演化成灾难深重的世界性大战，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巩固与发展面临着严重危机，资本主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6。



义自身也处于生死攸关、你死我活的位置。居安尚且思危，居危之中的斯大林必须把一个多年散乱、懦弱、贫穷的众多民族凝结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像当年彼得大帝用野蛮牵着俄罗斯转向西方一样，斯大林在国际丛林中的顽强胜出不仅是对战争危机的成功应战，而且证明了苏联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胜利。最后是时间的压力。由于存在经济基础薄弱、文化程度低下、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等不足，如何通过和时间赛跑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经济军事的飞跃式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存亡的华山绝径，要么生存，要么死亡，别无二途。当欧美原生资本主义国家用一百年的时间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高的生产力时，苏联继续沿着资本主义兴起的老路，依靠市场自己的力量和方式，从原始积累开始，经过自由竞争的推动，逐渐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等，显然在时间上不具有可行性，何况，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如市场、资源、环境等。因此，通过集权的方式，即以国家的力量通过非正常的经济发展手段实现经济飞跃，无疑是一条可以探索并选择的方案，这条道路在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腾飞和民族崛起过程中曾经发挥过有效的作用，区别在于德、日等国采取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而苏联探索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显然，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水平，没有为革命准备好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只造成了一种客观的历史紧迫感：即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如果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就存在沦为西方大国附庸，趋于被压迫、剥削、奴役乃至灭亡的可能。十月革命恰恰执行了俄国工业化的客观使命（吉登斯），同时，把俄国迈向现代世界的使命落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斯大林成为继列宁之后引导苏联最终走完这一历史性跨越的英雄，毫不夸张地说，他一手缔造了苏联，一手开创了社会主义。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种实践必须严格地局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倘若以变化了的结果进行衡量，正如以蛮族入侵导致希腊、罗马的衰弱进而否定两者的文化成果，或者因资本主义取代传统社会而抛弃中世纪的历史价值一样，荒谬而且没有意义，我们今天更不能仅仅因为苏联和斯大林体制的存废而遽论他的功过，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克鲁格曼曾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谈到不久前的诸多权威提倡基于优越的亚洲体制和独特的亚洲价值之上的亚洲奇迹，现在同样有很多权威（很多就是之前的那一批权威）坚持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失败的亚洲体制的必须结

果。如果亚洲体制真有弥天大错的话，过去那么长时间它怎么会成功呢，今天又怎么会突然崩溃呢？所以，我们在研究和评价斯大林体制时，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克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态度，即不要只是简单将过去对斯大林体制的崇拜颠倒过来，一会儿把斯大林模式捧上天，一会儿把它踩在地，而是需要平心而论。

第三，客观、公正地分析斯大林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兴衰，不仅涉及马恩列斯等人思想的科学性问题，也不只是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的正确性问题，它牵涉到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国际形势、人文传统、个人素质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问题，它直接反映了苏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现代转型，俄罗斯民族的崛起与复兴，同时也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命运。如果仅仅出于怀念、记忆和感慨重新研究和分析这段历史，未免显得小题大做、哗众取宠。重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未来的路能够走得更顺、更稳、更好。为此，我们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斯大林体制，在分析评价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新经济政策理想化，在批判斯大林时又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而反思俄国革命的‘新保守主义者’时，又把革命前的沙俄看成是黄金时代”等这样一些理想化的倾向，这些建立在主观意志上的态度和方法无助于人们客观认识和评价斯大林体制，反而会把正确的经验教训引向歧途与错误^①。例如，人们常常指责斯大林教条地推行计划经济、公有制等马克思明确或隐约提到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如果取消了马列主义的领导、取消了计划经济、取消了公有制或社会所有，斯大林怎样从理论上确立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呢？他跟政府调节、社会保障、国有企业同样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重复着一个错误：即往往一边指责斯大林教条地照搬马克思或列宁的某些结论与设想，一边又要求他的制度必须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预设，同时又要摒弃后人看来马克思不够完善的地方，创造一个一劳永逸的终极世界。这不仅对于那个时代的斯大林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事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没有人能够实现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理想世界。因此，

^① 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



评价斯大林模式要恪守在“历史的枷锁下跳舞”的原则，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僭越、不苛求。

应该看到，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在理论指导下对理想社会有意识、有计划的实践与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等先驱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苏联当时所处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方面还是失败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对斯大林及其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无论是“暴君”、“独裁者”还是“统帅”、列宁的“捍卫者”，斯大林的功绩是无法抹去的，其错误也是不能原谅的。对于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我们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这是不足取的；轻易把斯大林模式贬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必须慎之又慎，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 and 判断^①。对待斯大林及其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不能简单地以“功过”或“对错”来判断，也不能以功过比例、对错比例进行简单类比，因为谁都无法准确地测算出“功的分值”或“过的分值”，也就无法进行简单的加减。而且，功与过常常属于不同类型的情况，如经济上的“功”或政治上的“过”，它们两者之间如何进行量化对比？事实上，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泾渭分明，功不能抵过，过无法掩功。成功中包含着失败，失误中蕴藏着成绩。毫无疑问，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是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讲，历史发展过程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②。可以说，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是国际共运公认的旗手，他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

总的来看，透过斯大林体制的萌芽、生成、定型和发展转变，苏联共

① 周新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辨析》，《学术探索》，2004（8）：71-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和失误，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正确的理论态度，也没有提供明确清晰并符合苏联国情的建设理论，更没有在党内形成统一的认识，最终由于思想理论的分裂和争论导致党内斗争的加剧，使理论之争和政权之争、党内斗争纠缠在一起，国内政治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最终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剧变埋下了伏笔。实践上，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崛起、取得经济社会建设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隐患，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累积下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即使继任者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改革，但是，划地为牢、徘徊犹豫，特别是斯大林体制中存在的突出民族问题、党内斗争、僵化体制、高度集权等弊病成为苏联经济社会停滞不前并最终引起剧变、丧失政权的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兴起了对斯大林、对苏联的重新评价运动，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为人们全面、多样地了解苏联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国际社会开始以更加冷静、客观和公正的思路重新解读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政治家乃至普通民众认识到：正是由于斯大林时期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为苏联乃至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苏联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可以说，苏联的胜利是斯大林的荣耀，也是俄罗斯民族的荣耀。2003年，俄罗斯《导报》以“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时代”为题报道了全俄社会舆论中心的一次民意调查，高达53%的人认为斯大林对国家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例如：奠定了苏联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包括免费医疗教育和住宅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2008年启用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科书认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他作为一个面临战争的国家领袖在带领国家走向工业社会方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①同时，世界各国的思想家、专家开始摒弃意识形态的干扰，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这一列宁开启、斯大林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体制对苏联和世界的意义，给予恰

① 俄教科书重新评价斯大林. 环球时报, 2008-8-26 (4).



如其分的评价的同时，积极吸取经验、教训及营养，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动力与借鉴。

历史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的发展又是不能割断的。历史的旧账如果不加以清理的话，今天就不知道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就不能辨别过去和现在的真理和谬误，就不能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蕴涵的人道和理性精神，对此，我们更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各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重新认识同斯大林模式相联系或以斯大林模式体现出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它进行清理、发掘和讨论，弄清哪些地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哪些内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临时措施，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恢复社会主义实践应有的声誉，在改革中不断前行，这既是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前提，也是我们继承、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前提。

20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半个世纪以来，曾经让马克思感叹“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唤出了巨大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次施展它的“魔力”，欧美各国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发展高潮，经济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社会和平而且欣欣向荣，经济危机被有效地控制与预防。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生产关系等都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知识与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世纪初的20%提高到70%，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传统农业、工业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蓝领工人”逐步被“白领”、“粉领”和“金领”所取代，与“血汗工厂”相联系的传统贫困无产者正在消失，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员中的90%是知识型劳动者。资本主义兴起时的单一占有制结构正在向股份制、合作制、国有制、股份合作制等“混合经济”转变，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反贫困计划等一系列国家干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两极分化、缓和了社会矛盾。福利国家制度满足了列宁改造资本主义的大部分要求，即保障充分就业和群众的经济福利，农业生产率通过政府支持研究计划已经大大提高，累进所得税以及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其他措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收入再分配，减少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随着全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